



*reviewed her*

*serabl*

*about*

*and forced to a*

*double agent*

*of CIA of*

*how she escaped*

*spy life*

# 谁是我真正的朋友

## ——一个女间谍的倾诉

〔联邦德国〕赫·波·沃纳梅克 著

唐步生 杨珂 译



# 谁是我真正的朋友

——一个女间谍的倾诉

[联邦德国] 赫·波·沃南梅克 著  
唐步生 杨珂 译

解放军出版社

**谁是我真正的朋友**

——一个女间谍的倾诉

〔联邦德国〕赫·波·沃南梅克 著

唐步生 杨珂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4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5065-0778-1/I·107

定 价：2.30元

## 出版说明

本书是以真人真事为背景撰写的一部畅销书。作者赫尔加·波尔·沃南梅克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亲身经历和苦难遭遇，讲述了她被诱迫充当苏联克格勃间谍、克格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双重间谍以及最后为摆脱这种可怕的生涯而逃走的整个历程。

沃南梅克出生在波兰和德国交界的一个波兰小镇上，祖籍是德国人。希特勒入侵波兰，她的全家被遣送到德国。她上学时参加过希特勒女青年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两国军队先后接管她家的所在地区，她先后与美苏接管部队的人员博勃和安德烈有过恋爱关系。她在给苏方当翻译期间，因救助熟人被指控泄密，判处十年徒刑，押送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监狱劳改。

一次，在特大的暴风雪中，她被大雪掩埋，送进了停尸房。狱医尤里奇迹般地救活了她，给她起了个俄国名字——捷莲娜·基里洛夫娜·普什科娃，带她回莫斯科，帮她成为苏联公民，跟她结了婚，并设法送她进了莫斯科大学。然而，尤里是个有妇之夫，暴露后，沃南梅克只好与他离了婚。在痛苦之际，安德烈找上门来了，随后与她结了婚。但不久，尤里与原妻离了婚，又借故闯到她家里来，利用上头追究安德烈和她的问题进行恐吓、离间，直至哄骗、挟持她一起逾越边境外逃，结果被边防军抓获，以美国间谍嫌疑罪再

次投入监狱。

在狱中，她拒不认罪，最后上书苏维埃主席要求当面“坦白”。这以后，克格勃经过核实，了解了她的真实情况，赦免了她，但看中了她美貌多才，诱迫她当上了间谍，几次送她到间谍院校培训，先后派她到奥地利、巴黎、民主德国、西柏林等地搞监视、侦查、跟踪、刺杀、色情引诱等间谍活动，还让她充当了中央情报局的双重间谍。她给克格勃做了不少事，但有些事却反其道而行之。

6年的间谍生涯、残酷的事实，终于使她觉醒。她厌恶这种受人监视、控制和摆弄的生活，并决心不再干这种肮脏、受凌辱而又充满危险的勾当，于是巧计逃奔到西柏林……

本书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看到战后苏联的社会面貌和西伯利亚监狱的劳改情景；了解间谍的阴险神秘活动和可耻行径；透视她那充满反抗情绪的内心世界和最终觉醒以致逃奔的必由之路。书中故事情节曲折，悬念迭起扣人心弦，加上文笔流畅、文字质朴无华，值得一读。

本书原名是《夜幕下的红色女间谍》，于1978年首次在联邦德国出版后，颇为畅销。同年底，英国著名翻译家里纳·威尔逊把它译成英文，由伦敦利奥·科珀出版公司出版，大量发行。同时，西欧其它国家也出版了此书。这次，译者根据英文版本译出，我们根据书的内容改为现名出版，以飨读者。

## 序 幕

卢比安卡监狱赫赫有名，莫斯科、整个苏联以至全世界都知道它。在监狱的走廊里，看守正领着一位新来的女犯人。对她来说，这所监狱并不陌生，但她没有想到，这臭名昭著的监狱会是这样的静谧和枯燥无味。走廊里像城市里的街道一样，装有红绿灯。红灯亮时，行走的犯人必须停下，面朝墙壁站立，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消失，绿灯再变亮时，才能接着走，犯人之间绝不能彼此见面。

她穿着一身苏联的土色军用制服，这衣服穿在一位怀孕的女人身上，看起来是何等的别扭。她的衣服被接待人员拿走了，给她的就是这些可怕的东西。在卢比安卡监狱第2号注册中，记载着她的详情。捷莲娜·基里洛夫娜·普什科娃，生于1927年，与苏联陆军上校安德烈·西德罗夫结婚。在整个关押期间，她一直想念着安德烈和她所期待着的她的孩子。她非常渴望能有点吃的东西和睡上一觉，哪怕仅仅是为了未出生的孩子。

现在，走在被提审的路上，她得把食物和睡眠置之度外，首先设法集中注意力思考审问时什么该说和什么不能说。她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打她，她会讲出所有的东西，但毫无疑问，处于她现在的状况，他们不会打她。

看守在656号房间前停下，门顶上有一盏绿灯，犯人被领到一个明亮而舒适的房间。房内布置着沙发、两个长靠

椅，一张油光漆亮的写字台。墙上像片中的斯大林同志慈父般地着她。

他们的确没有打她，相反，摆在她面前的是一顿她盼望已久的美餐，有烤鸡、白面包、黑面包、黄油、果酱、葡萄、橘子以及甜点心。而此时在乌克兰正闹饥荒……。

然而，她仍未获许去享受这顿美餐。一个长着红头发、红眉毛、蓝眼睛的克格勃人员，走近她的身边，象一个仁爱的大叔，对她慈祥地说：“孩子，你还这样年轻漂亮，如果我们把你长期留在这里，岂不太可惜吗？”

她沉默不语。

“你为什么不承认你为美国人工作呢？”克格勃人员继续审问她。

她说：“我没有为美国人工作过。”那是真情。

“你企图越过边境时被当场逮住，忠诚的苏联公民决不会干这种事。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有逃跑的企图？”

“不，我没有企图逃走，”她答道。那显然是谎言。克格勃人员轻轻地摇了摇头，并调整了一下放在她面前的盘子。犯人双手捂着脸，避开食物的引诱。而那个声音仍然在继续：

“真相，同志，请告诉我们真相。”

## 目 录

序幕	( 1 )
第一章 破碎了的忠诚之心	( 1 )
第二章 不受欢迎的求爱	( 10 )
第三章 十年苦役	( 18 )
第四章 学徒司药员的冒险	( 27 )
第五章 暴风雪	( 36 )
第六章 女兽医的闯入	( 44 )
第七章 深山之夜	( 53 )
第八章 “铁册”里最新的名字	( 61 )
第九章 公正的审判	( 67 )
第十章 分挽阵痛	( 75 )
第十一章 重要的使命	( 84 )
第十二章 第一次任务	( 92 )
第十三章 维也纳华尔兹舞	( 99 )
第十四章 在执行任务中	( 108 )
第十五章 德国绅士	( 119 )
第十六章 生日礼物	( 127 )
第十七章 可怕的小岛	( 135 )
第十八章 为暴君落泪	( 146 )
第十九章 奇怪的回国之行	( 155 )
第二十章 复仇的快乐	( 161 )



第二十一章	最年轻的新手.....	( 168 )
第二十二章	两面手法.....	( 178 )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旅程.....	( 185 )
尾 声.....		( 191 )

## 第一章 破碎了的忠诚之心

真相又从何说起呢？捷莲娜·普什科娃不是我的名字，我不是俄国人。如果再往前溯，我也不是真正的德国人。我的真名叫赫尔加·沃南梅克。十一岁前，我住在加利西亚<sup>①</sup>的代利阿廷镇，我的父母、祖父母一直居住在那里。我们过着舒适的小康生活。我们家有锯木厂、农场和盐矿。我的童年是幸福的。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一夜之间结束了所有这美好的一切。沃南梅克家族的祖籍原在德国，因此，哥哥约西和我受到那些没有怜悯心的孩子们的嘲笑和漫骂，即使我们的朋友也不再理睬我们。开始时大人们所受到的非难还很少，父亲的雇员仍很忠诚，有事仍向他请示，听取他的建议。但实际上此时他已无多大能量了。

后来。当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时，代利阿廷被划在苏联辖区内，我们的锯木厂被宣布为公共财产，禁止父亲入内。木材和机器以及农场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甚至连我的小矮马都被送往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活对我们父母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苏联当局决定把我们一家遣返到号称“第三帝国”的德国。

虽然做法是粗鲁的，但约西和我对此感到暗暗地高兴。

---

<sup>①</sup>系旧地区名。在今波兰东南部，属维斯瓦河上游谷地。——译注

走时女人和小孩坐火车，男人坐卡车，每人允许携带25公斤的行李。妈妈就是舍不得丢掉家中那些金银首饰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离开前的最后几天，她还把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彻底地搜索了一遍，“为了有朝一日能重返家园”。圣诞节那天，我们终于离开了。那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锁好，就好象我们只是出去短暂的旅行。

越过边界后，妈妈和我在遣返营度过了令人烦恼的几个星期，等待着与父亲和约西团聚，然后一块走。2月底，我们抵达了目的地，此后，情况开始略有好转，父亲安装了电话，我们也很快都搬到离布雷斯劳约40公里的一个叫斯特伦的小镇上，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

起初，这里的学校比被德军占领的代利阿廷的学校更折磨人。在那里，我被称为“德国佬”，到这里又成为“波兰佬”。我的德语讲得不很好，课程也跟不上，老师和同学们都嘲弄我。由于我有天赋的跑跳能力，才较快地结束了这种受人污辱的处境。同其他人一样，我也不得不加入“希特勒女青年军”，当时主要是搞体育运动。这方面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胜过那些欺负和折磨我的人，很快我就成了当地的冠军和集体体育项目中的核心人物，那些成绩不好的德国人被冷落了。

第二年，我被选拔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全国青年田径赛，我夺得了跳远冠军，希特勒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从很近的地方仔细地看了看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 \*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宣战。为了向乌克兰进军，第三帝国需要翻译人员。当时我已会说波兰语和乌克兰语，德语也已相当不错，但还要求我学习俄语。我们住在寄

宿学校，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除了体育和艺术课外，我们这35个享有特权的学生，接受彻头彻尾的政治灌输，我们被看成是具有纳粹女性气质的杰出人物，纪律严明，工作艰苦。除了令人厌恶的政治外，我们都愿意在这种相当奢侈的环境下，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一年的学习结束时，我再也不想回到普通的学校去继续学习。接着就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工作，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特斯伦军事医院的药房、希特勒女青年军和俄语的学习上了。

秋天，约西从东线回来休假。他是在我上学期间参军的，尽管他获得了铁十字勋章，并被提升为空军下士，但他仍显得很压抑。在回家的路上，他去了一趟代利阿廷。他告诉我们，在整个波兰正发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惨剧。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可怕的事。就在我们童年的经常玩耍的锯木厂附近的树林里，他亲眼见到我们的很多朋友被枪杀，他受到极大的震惊。回家后，他闭门不出，整天呆坐着，不愿见任何人，因为他内心的恐惧感仍未消除。假期结束时，他再也不愿回到部队去，有几天他甚至躲藏在马厩里或储藏草料的顶棚里。当然，最后他还是被宪兵抓走了。幸亏我们有一位叫克拉姆先生的朋友，他颇有影响，找人说情，才使约西免除了军法处置。

18个月后，人们对苏联战线所抱的乐观主义正在消失。即使在斯特伦这个小镇上，战争的影响已明显可见，从被轰炸的城市涌来大量的疏散人员，商店里没有多少东西卖，队排得越来越长。1945年1月，苏联军队进军西里西亚。尽管当局一再有令，不允许人员外流，但大量难民还是开始涌向西方。

沃南梅克一家也卷入这些人流。克拉姆先生在居斯顿有产财，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去那里。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

天气寒冷，道路堵塞，到处都是饱受惊恐的人群。军队抢占道路开往东方。一次，敌人的飞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扫射，我们被迫躺在壕沟里。飞机扫射后，雪地里血迹斑斑。

然而，在居斯顿生活却没有多大变化。我自愿到一家医院工作，参加了当地的希特勒女青年军分队，并参加田径俱乐部的体育日训练。城里偶尔也落上几颗炸弹。人们都在谈论着失败，战争将很快结束。然而，官方仍认为胜利即将到来，德国人民则更注重现实。这一年的春季，我快18岁了，克拉姆经常对我说，我很漂亮，我也几乎开始同医院里的病人谈起恋爱了。

\*

\*

战争结束了，美国人来到这里。德国的垮台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影响，与往常一样，我仍在谈恋爱。天气好极了，我第一次同征服者相遇是在我与朋友格尔达和阿代尔黑德在河里游泳的时候。我们比赛看谁先游到桥那边。当一帮美国大兵来到时，我们正在桥下打水仗。美国人命令我们出水，把我们赶上一辆吉普车。我们浑身湿透，被带到了附近的指挥部。他们硬说我们是在企图炸毁那座桥。不久，一位名叫博勃·凯利的漂亮的军士成功地说服了所有的人，他说我们是没有恶意的。释放我们时，他开车把我们送到河边取衣服，然后，把我们每一个送回家。我是最后一个，临下车前，他问我们能否再见面。第二天傍晚，他穿着一身新浆洗的衣服，来拜访我的父亲，假装他是来执行上尉的命令对桥头发生的事件表示道歉。随后，父亲把他称之为非常可爱的人。

“卡尔，你怎么能这样评价，他是美国人！”妈妈责备道。

“那又怎么样？我们不应囿于民族的偏见，很多美国人的祖籍还是德国人呢！”

虽然博勃·凯利的祖籍不是德国人，但他很有心机，经常来看望我父亲。正象他所预料的那样，我变得期待这样的来访，并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宽肩膀、黑胡须的人，比我现在的男朋友要有趣得多。

“凯利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爸爸说。他并不介意博勃偶尔带我出去散步。当然，妈妈对此并不热心，她认为，年轻的女孩子晚上7点钟就应该归家。但住在阿尔斯莱本的莉莎姑母思想比较开放，只要我认为高兴时，我就同她住在一起。我经常以此为借口，出去同博勃约会。通常博勃开着吉普车在城外等着，我骑自行车去找他，然后把自行车放在吉普车的后箱里，在外边玩上一整天。

格尔达和阿代尔黑德也住在阿尔斯莱本，必要时我就告诉莉莎姑母，我将和她们住在一起，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博勃带我到另一个部队参加晚会，我们疯狂地跳舞和大量地喝酒，一直玩到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博勃想得很周到，预先在旅馆订好了时间，我们就不需要驾驶着敞蓬车回去，免得着凉。住旅馆时，他没有让我一个人单独地住在陌生的房间里。

早晨醒来时，我大声喊叫，感到后悔。博勃就安慰我，说：“亲爱的，不要叫喊，没有什么要后悔的，我们结婚，一定！”他还告诉我其他很多事情。他说找到一个德国姑娘做妻子感到很高兴。他甚至真的向我爸爸提出要与我结婚。

“亲爱的凯利，”爸爸笑着说：“孩子才刚18岁！再等一年我们再谈。”博勃和我对此不得不表示满意。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计划的事情会完全改变。就在和父亲谈话后不久，博勃开着吉普车到我家，非常焦急地

告诉我们，美国人就要开拔去柏林，苏联的军队将接管他们的地盘。他恳求我说服全家去柏林，以便我们能住在一起，然后，他就一溜烟地开着车走了。

我们全家在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办。我们都很害怕苏联人。但妈妈生病卧床不起，我们怎么能收拾行李、逃之夭夭呢？不能！沃南梅克一家已受够了逃亡的罪。尽管有博勃，我也不愿去柏林。

美国人一离开，俄国人就到了。人们都闭门不出，惶惶不安，坐待事态的发展。一天夜间，有人敲我家的门。市长夫人和一个苏联士兵站在门外。苏联人需要翻译，要让我去市政厅，爸爸坚决不让我去，我也非常遗憾当初学了俄语。但市长夫人恳求道：“沃南梅克先生，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其实不关我的事，你想他们用武力把赫尔加带走吗？”

那个士兵已显得不耐烦，父亲终于作出了决定：“告诉他，只有答应一个条件，即我也去，才能让赫尔加去。”稍停顿了一会，我作了翻译，俄国人很平静地点点头。

“可以，可以！”“快！快！”俄国人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苏联人讲俄语。后来，我听到它就厌恶。

市长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充斥着强烈的俄国烟草味，一位佩戴两星肩章的军官问我是否会讲俄语。

“会，但讲得不很好。”

“行，试试吧！我们需要一所比较大的房子作指挥部。”

我与父亲和市长进行了协商，他们同意把原地区党的理事会大楼提供给苏联人。我翻译后，苏联军官笑着向我表示感谢。看起来他不象要伤害任何人。

他称赞说：“你的俄语讲得很好！你可以走了，非常感谢。”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一边走一边发牢骚。

“不行，完全不行。现在他们一旦需要翻译，每次都会派人来找你，太危险了。”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阿尔斯莱本，住在你莉莎姑母那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会讲俄语。”

我倒也喜欢这个主意。在阿尔斯莱本，我到一家化工商店工作。由于库存药品所剩无几，新的货源又遥遥无期，所以要干的事情不多。苏联人看起来完全不坏。斯大林宣布，任何一个士兵如果强奸一个德国女人，将被判10年徒刑，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他们并未象在代利阿廷那样，把一切都收归国有。即使前党的官员克拉姆先生也获许经营他自己的财产。在此情况下，我冒险回家度过一次周末。

我的牝马汉卡需要活动。我想骑它到丛林中的小路上溜溜，估计不会出事，可我错了。我遇到了一群苏联大兵，他们把我当成了富有的农庄主。尽管我一再解释和抗议，也毫无作用，他们迫使我下马，把我和汉卡关在一个车库里。在那里被关了5个小时之后，我被带去见他们的指挥官。

他的名字印在办公室的门上，叫安德烈·西德罗夫中校。我立即认出他就是那天在市政厅里我给当翻译的军官。

“这多么令人惊奇啊！”他笑着说：“你一直藏在什么地方？我们找了你好几个星期。”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我大胆地问他：“你们想把我怎么样？你们不能宰了它吧？”

“宰你的马？把我们看成是什么人？我们不缺少肉。摒弃你的偏见吧！对了，你吃饭了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饿得很。他叫通讯员拿来了食物，有鲑鱼、烤牛排、蔬菜以及伏特加酒。这是我吃的第一



顿俄国饭，味道不错，但我急着要回家，并没有吃完。

指挥官要来他的车，亲自开车送我回家。不久，一名士兵把喂饱的汉卡送了回来。第二天，指挥官正式拜会我父亲。他提出要我担任指挥部的翻译，父亲没有说话。

“考虑一下吧！”苏联人建议说：“我明天再听你的回话。”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父亲说：“他态度这样友好，令人惊奇，俄国人中也有真正的人！”

全家人就此进行了讨论。克拉姆先生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个请求，这样做会有利。

他说：“翻译比其他任何人对指挥官有较大的影响力。”第二天，父亲作出了同意的答复。

克拉姆先生确有先见之明，我很快就在居斯顿成了著名的和有影响的人物。西德罗夫中校是位精力充沛的人，他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战后的混乱。商店重新开张，工厂恢复生产，甚至地方的政治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没有任何东西是我宁愿翻译或呈送指挥官阅览的。无论是申请旅行或询问战犯的踪迹，人们都首先向我说明情况，在公开场合，我经常同指挥官的意见一致。他叫我“捷莲娜”，因为我的第二个基督教名是“赫伦·赫尔加”，对俄国人来说太难发音。我叫他“指挥官同志”。

博勃终于听到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一天下午，他穿着整齐的制服，上衣口袋里装着“三炮台”香烟、糖果盒等，显得鼓鼓囊囊的。他当众亲吻我，引起了一阵喧闹。

“亲爱的，我以为你会害怕俄国人呢！”

“噢，他们并不坏”，我急切地回答说：“这都是宣传造成的。这里的指挥官是一位真正的好人！”